

市场经济研究丛书

Shi Chang Jing Ji Yan Jiu Cong Shu

当代西方 财政经济理论

上册

王传纶 高培勇 著

商务印书馆





当代西方 财政经济理论

王 健
王 健 著

王 健 著



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

上 册

王传纶 高培勇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1995年·北京

DĀNGDÀI XÍFĀNG CÁIZHÈNG JINGJÌ LĪLÜN

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

(全 两 册)

王传纶 高培勇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774-2/F·201

1995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408 千	
印数: 4000册	印张 17 1/8	

定价: 22.20 元

《市场经济研究丛书》

出版说明

市场机制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市场对经济的运行，并不是万能的，它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目前国内外的经济理论界、政府部门和实业界等均积极开展“重新理解市场经济”的研讨。他们对于市场概念、市场作用、市场发展、市场体系、市场结构、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宏观基础、市场失灵的原因，以及整治市场失灵的方案等等问题，有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理解。

根据社会实践与理论研究，国内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世上并不存在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政府应当采取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并用的政策。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促进效率，提倡公平和扶植宏观经济的增长与稳定。今天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不受到政府机构的带有或多或少强制性的指导。只有国家干预和市场相结合才能形成较为正常的市场经济。市场越发达，国家干预越重要。

为了加快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我国也正在应用市场这一重要工具，力争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为配合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我们特编辑出版这套《市场经济研究丛书》，有选择地印行我国学者研究国内市场经济问题的论著，以编写或翻译形式适当反映国外学者在市场经济领域，特别是市场经济理论及其演变、各类市场经济运行

以及市场实务操作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供读者参阅。如有不妥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前 言

(一)

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取名《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实是一次学术上的探索。探索的长远目标是比较大的，想在财政学科中找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但我们这本小书的任务则比较小，只是循着这个方向走了一步，而且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般的一步。当今，“渐近主义”颇受非议。但大到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小到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如果说“渐近主义”则未必恰当，但渐进却是必要的。

理论体系的建立，一要有合理的框架，二要有足够的构件。我们这本小书，就是为财政科学的理论框架作一点准备工作。

我们多年来从事于财政经济理论教学，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轨”上费了不少岁月，对资本主义理论观点的批判投入不少精力。由于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缺少历史的、系统的考察，批判未曾深入；批判应能起扬弃的作用，但多年来未能从批判中充实社会主义财政的理论和实践。

在上述“平行”教学中，不时也浮起这样的想法：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中，财政有无共性？如果有，能否由此认识某些范畴、某些关系、某些规律，足以构成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呢？如果真能做到这样，岂非对我们财政工作的实践也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吗？

多年来有不少学者作了若干探索。不少人认为，古往今来，财政总归是社会产品的一种分配。这种说法不难接受，但仍有种种疑问：财政这种分配的范围有多大？分配的目的是什么？分配的机制又是怎样的？这些疑问难有恰当答案。因而，财政作为一种分配的共性也就微不足道了。也有一些人把满足国家需要作为财政的共性，但国家有阶级性而阶级性又有本质的不同。因而，这样的说法在当时就有点“离经叛道”的味道了。当时也还有一种说法：财政虽然纷纭繁复，但总归是某种货币关系。但“某种”如何界定？货币关系又有什么内容？这些也难于弄清楚。回顾几十年的探索，很像“瞎子摸象”，接触到一些表面现象，但抓不住本质。

现在，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不可缺少的内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财政既是国家对经济的一种宏观调控，它不能脱离市场经济，也不排斥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能没有财政，二者之间有本质性的关系。

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妨对不同社会制度下财政的共性另作一些探索。市场经济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已有几个世纪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正在形成和发展。既然不同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运行方式有相同之处，那么，从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角度，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财政难道就没有任何共性吗？

从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关系去抓住财政的共性，看来是可能的，但尚未成熟。由此去建立财政科学的理论框架，也为时过早。那么，现在应当做些什么？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想到的一步就是对当代西方的财政理论著作作一些考察。随着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的扩大，我们接触到许多西方的财政论著。这些著作都是在这半个世纪中写

的，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运行不那么顺利的环境下写的。他们的观点和理论内容有很多差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不由自主地注意了国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作为我们探索的第一步，就写了这本《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

（二）

认识因实践而深化，由比较而获得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比较研究上有着优势。

我们长时期处于传统的、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对当时本国的财政工作和财政理论有过较多的了解。我们目前正投身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事业，对这样的体制下财政的位置和功能虽还未必很清楚，但方向和道路已经明确。在这时候，对西方财政作一番比较研究，是能“为我所用”的。

半个世纪来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演变，原因在于经济环境的变化。这些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又成为这些国家制定财政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我们这本小书，本身属于思想史范畴，但其一端与经济史相接，另一端与西方政治史有关。这也是财政的位置所决定的。

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在谈到财政学的定义时，往往采用这样一种表达方式：财政学是一门关于公共部门的政治经济学，它旨在描述和分析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他们所说的“公共”，主要就是政府。他们所说的“公共部门”，指的是与私人部门相区别的另一个经济部门。

由上述定义出发，西方财政学的研究是从政府经济活动的意义入手的。其基本的线索是：由市场机制失灵的分析，揭示政府经

济活动的必要性,界定政府经济活动的范围和公共财政的职能,进而讨论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一般原理。在此基础上,将分析对象具体化为公共财政的各个组成要素,即公共支出、公共收入、公共预算、财政政策、税收和公债。

本书的讨论也是围绕这一线索而展开的。全书分为4篇共18章:

第1篇包括1—4章,侧重于公共部门经济活动一般原理的阐释。第1章讨论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这一章通过对资源配置效率、市场机制失灵、政府经济活动的范围以及公共财政的职能等问题的分析,意在给出研究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基本线索。以此为起点,第2、3和4章分别讨论了公共财政领域的三个重要理论范畴:外部效应、公共物品和公共选择。对于外部效应和公共物品的讨论,重点在于说明外部效应、公共物品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以及将矫正外部效应、提供公共物品列入公共财政职能范围的经济原因。对于公共选择的讨论,则旨在将财政决策同政治程序联系起来,用经济学的方法解释公共收支决策的制定过程。

第2篇包括5—9章,侧重于宏观财政理论与政策思想的阐释。在这一篇中,分析的对象开始具体化为公共财政的各个组成要素。第5章讨论公共支出,公共支出的结构、经济影响及其增长模型,将成为考察的重点。第6章是对公共财政的效率的分析,主要说明进行预算决策分析的两种方法:机会成本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第7章概括讨论了公共收入的主要形式,先后进入考察视野的有税收、公债、政府引致的通货膨胀、对政府的捐赠、使用费和规费。第8—9章转入对财政政策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财政乘数的讨论。这两章提供了一个分析公共财政对经济均衡作用的理论框架。

第3篇包括10—15章,着力于税收理论及其制度结构的阐

释。第10章讨论税收原则理论，突出说明了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两个方面的原则。第11—12章讨论税种分类与税制结构，从税种的各种分类方法以及税制结构的设计原理入手，着力考察了当今西方国家的三大课税体系：对所得的课税、对财产的课税和对商品的课税。第13章是对税收效应的分析，依次考察税收与生产者行为、消费者行为、劳动投入、私人储蓄、私人投资等方面的关系，进而指出了税收在这些方面所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第14章对税收的转嫁与归宿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在廓清了税收转嫁与归宿的含义和形式之后，着力说明了税收转嫁与归宿的两种分析方法：局部均衡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第15章的讨论则进一步扩展至开放经济，就国际间对商品课税制度的协调，对所得课税制度的协调，对跨国收入和费用分配的协调以及对国际避(逃)税防范措施的协调等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说明。

第4篇包括16—18章，着力于公债的运用与管理问题的阐释。第16章讨论公债运用的一般原理。有关公债的理论观点、公债的运用原则、税收和公债发生替代关系的可能性与上述替代条件下消费者的行为，以及公债的用途，将依次列入考察的视野。第17章转入公债管理的考察，重点在于说明公债的种类、发行、应债来源和还本付息等方面的情况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影响。第18章则以公债管理与宏观经济调控作为标题，在对公债管理的两种效应——流动性效应和利息率效应作出相应界定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公债管理作为一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传导作力机制及其同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

(三)

用这样一本小书来概括半个世纪财政理论的发展，当然很难

周全。取舍实属难免。取什么？那就是与“政府——市场经济——财政”这条线索有关的理论观点，但这类观点往往是某个学者或某本著作的思想基础，如果仅仅截取某几句话或某些章节，抓不住要点，对我们也没有多大参考价值，因此，我们在这本书里力求对这个时期的理论发展作比较系统的分析和介绍。我们也要舍掉一些东西。那就是与上述线索不那么直接地关连着的枝枝蔓蔓，或者，较为技术性的阐述。

在此还想简述一点。写这本小书，只是第一步探索。那么，第二步又将是怎样呢？我们考虑了两种可能。一是以我国从90年代跨越下世纪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为背景，建立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的框架，吸收西方有用的观点，形成体系；这样做的好处是与我国财政工作实践的結合较为密切。二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写一本规范性的财政理论著作，不必冠以中国两个字，也无须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这样做的理由是：我们深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将是目前不同社会制度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终究要走向的目标。

两种可能，应能走哪一步呢？这实际上不是经济学者主观上能作选择的。这决定于实践，决定于实践的成就和实践的需要。

（ 四 ）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西方的财政理论体系虽然已经把国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放在重要位置，但背景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因而与我国传统财政学理论体系是很不同的。对于初涉西方财政经济理论领域的读者来说，这样的线索可能还有些陌生。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家习惯于吸收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成果来深化经济理论分析，并且注重非经济因素给予经济生活的

影响的现代研究方法，对于习惯于纯粹从思辨的角度来分析经济问题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感到有些费解。因此，初读本书很可能不是轻松愉快的。不过，只要具备一些基本的财政经济理论知识，加上一点儿耐心，读完全书，将能从另一个角度来领略财政理论的情趣，或能受到一些启迪。

诚然，在吸收、借鉴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中一切有用的思想、经验和方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和认识其中的谬误和缺陷。这是因为，同一般西方经济理论一样，西方财政理论也具有科学性的一面和非科学性的一面。我们的态度仍然是：有分析地吸收借鉴前者，恰如其分地批判扬弃后者。

（五）

本书的写作历时一年，费力颇多。在此过程中，承蒙商务印书馆经济编辑室吴衡康主任以及编辑室其他同志给予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天津财经学院刘秀丽、刘红艺两位同志帮助誊写部分手稿，我们在此谨致诚挚的谢忱。没有他（她）们的帮助和支持，本书决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同读者见面。

当然，对于书中可能存在的任何错误和不当之处，应由我们负责。我们诚恳地希望得到同行和广大读者的指教。

作者

1993年11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第 1 篇 公共部门的政治经济学

第1章 市场和政府

西方经济学家对于财政经济理论的阐释，是从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意义开始的。其基本的思路是：由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评判入手，分析市场机制的缺陷，揭示政府经济活动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界定政府经济活动的范围和公共财政的职能。

本章的讨论也将循着这一思路进行。

1.1 资源配置的效率：含义与条件

1.1—1 效率的含义

西方经济学家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视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并把“效率”作为评判社会资源的配置状况的标准。

那么，如何把握和理解资源配置效率的含义呢？

如果经济社会中只有一个人，资源配置效率的含义是很容易说清楚的。西方经济学家常用的是鲁滨逊的例子。这位处在荒岛之上的英国人清楚地了解其可资利用的全部资源以及可供其使用的技术手段。对于自己所需物品的种类、数量以及对各种物品的偏好顺序，他也了然于胸。于是，他根据自己的需要顺序安排生产，产出的构成将使他获得满足。如果有一天他的需要发生了变化，

他可以改变资源的用途，从而生产出新的物品构成与他的新的需求相吻合。所以，鲁滨逊和其所生产的各种物品之间的关系是一目了然的。然而，鲁滨逊的例子不过是一个寓言故事。现代经济生活中的资源配置要复杂得多。在一个包含有众多消费者而且通过商品交换关系联系起来的现代化经济社会中，有多少消费者，几乎就有多少种需求偏好结构。如何安排出一种人人都满意的生产秩序来，即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状态，则是一个不那么容易说清的问题。

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对资源配置效率含义的最严谨的解释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菲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作出的。按照帕累托的说法，如果社会资源的配置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重新调整都不可能在不使其他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使任何一人的境况更好，那么，这种资源配置的状况就是最佳的，也就是具有效率的。如果达不到这种状态，即可以通过资源配置的重新调整而使得某人的境况变好，而同时又不使任何一人的境况变坏，那就说明资源配置的状况不是最佳的，也就是缺乏效率的。这就是著名的“帕累托效率”准则。

实际上，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帕累托效率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大多数的经济活动都可能是以其他人境况变坏为条件而使某些人的境况变好。帕累托效率准则的意义，不过是为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提供了一种最合理配置资源的理想状态。所以，可以将帕累托效率准则的实际含义解释为：经济活动上的任何措施，都应当使“得者的所得多于失者的所失”，或者从全社会看，“宏观上的所得要大于宏观上的所失”。如果做到了这一点，资源的配置就可说是具有效率的。①

①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所谓效率，无非是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这虽不像经济学家的定义那样严谨，但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1.1—2 效率的实现条件： $MSB=MSC$

在得到了关于效率的上述定义之后，效率的实现条件便可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直接给出。

为此，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社会总效益、社会总成本、社会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成本的概念。在他们看来，一种物品的社会总效益(total social benefit, 简称为TSB)是指人们从消费一定量的该种物品中所得到的总的满足程度。一种物品的社会边际效益(marginal social benefit, 简称为MSB)则是指人们对该种物品的消费量每增加一个单位所增加的满足程度。社会边际效益可以通过人们为增加一个单位的某种物品的消费量而愿付出的货币最高额来测定。例如，如果每条面包的社会边际效益是2美元，那么，消费者为获得一条面包将愿意放弃相当于2美元的其他物品的消费支出，同时其境况不会因此较前变好或变坏。如果消费者可以低于2美元的价格获得一条面包，其境况将会因此而较前变好。一种物品的社会边际效益随其数量的增加而倾向于减少。

一种物品的社会总成本(total social cost, 简称为TSC)指的是为生产一定量的物品所需要消耗的全部资源的价值。一种物品的社会边际成本(marginal social cost, 简称为MSC)则指的是每增加一个单位该种物品的生产量所需增加的资源消耗的价值。社会边际成本可以通过为补偿因增加一个单位的某种物品的生产量所消耗的资源价值而需付出的货币最低额来测定。例如，如果每条面包的社会边际成本为1美元，这一数额就是生产者在保证其境况不会较前变坏的条件下，为补偿因生产该条面包所消耗的生产要素投入而需付出的货币最低额。倘若他们出售每条面包所获取的收入超过1美元，其境况将会因此而较前变好。倘若他们出售每条面包所获取的收入少于1美元，其境况就会因此而较前变坏。